

QUANQIUHUA LAODONGLI LIUDONG
YU JINGJI KONGJIAN GONGGOU

全球化、劳动力 流动与 经济空间重构



中国发展经济出版社

杨云彦 敖荣军 朱金生 魏博通 著



全球化、劳动力流动 与经济空间重构

QUANGIUHUA LAODONGLIJIUDONG YU JINGJIKONGJIANCHONGGOU

杨云彦 敖荣军 朱金生 魏博通 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球化、劳动力流动与经济空间重构 / 杨云彦等著.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 - 7 - 5095 - 0999 - 9

I. 全… II. 杨… III. ①劳动力流动 - 研究 - 中国②区位经济学 - 研究 - 中国 IV. F249.21 F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2683 号

责任编辑: 伍景华

责任校对: 王 英

封面设计: 郁 佳

版式设计: 汤广才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URL: <http://www.cfeph.cn>

E-mail: cfeph@cfeph.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 100142

发行处电话: 88190406 财经书店电话: 64033436

北京财经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787×960 毫米 16 开 18.25 印张 298 000 字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560 定价: 39.00 元

ISBN 978 - 7 - 5095 - 0999 - 9/F · 0829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本社质量投诉电话: 010 - 88190744

前言

Preface

本项研究始于作者对人口迁移的关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的迁移与流动日趋活跃,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迁移的流向和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口迁移的宏观流向发生逆转,延续数百年的向北方迁移转换为向东南沿海迁移;城镇化进程加速,城镇得到快速发展;向稀疏地区进行开发性迁移转变为向人口稠密区的集聚性迁移,即由外延扩展型迁移转变为内涵集聚型迁移;迁移类型与机制发生变化,市场导向的迁移比重不断上升;工业和第三产业移民占居主导地位;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人口迁移的一个转换阶段,这一转换揭开了我国人口迁移与城镇化的新篇章。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口迁移的转变趋势不断深化和扩大,人口的大规模流动,重塑着我国转型社会的经济和社会格局。在人口迁移和流动加速的同时,人口迁移的宏观流向也不断集聚。中西部人口密集的农业省份全部成为净迁出省份,形成连片迁出地区,如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四川等。沿海省份则成为人口净迁入省份,并且人口迁移的集中程度日益明显。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的模式实际上是我国就业岗位的空间分布不平衡的结果,而全球化以及因此导致的经济活动空间格局的深刻变化则是出现这种结果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规模不断扩大的、流向日益向沿海地区集聚的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又进一步强化了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空间格局的重构效应,导致产业向沿海地区的持续集聚以及地区经济差距的持续扩大。

“经济全球化”(Economic Globalization)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它使各国各地区之间经济和贸易活动的联系不断加强,有利于新知识和高科技的迅速交流和广泛应用,有利于促进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从而提高各自的经济效益。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全球产业正以全球价值链的新形式重新进行空间组织。从区域层面看,全球化效应是复杂的,价值链的片段化也使不同区域出现分异,从而形成了地位不同、功能各异的等级产业空间。发达国家的优势区域在经济全球化中获益较多,并可能呈现出“极化效应”。发展中国家一些新兴的区域也成为接受经济全球化“阳光”的前沿阵地,受到惠益的程度相对较大,获得的机遇

相对较多。而广大的内陆地区则更多的是面临着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和被“边缘化”的威胁。

为什么经济全球化会带给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分配效应？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经济全球化下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经济全球化在本质上是非均衡的，因为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和发展并非均匀地辐射到世界的每一角落，悬殊的地位和作用导致发达国家（地区）和发展中国家（地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产生了经济收益的巨大反差，同时经济全球化促使各种生产要素向优势地区集中，人才、资金、技术等向发达地区转移，致使区域间发展呈现不均衡状态。

所谓边缘化，是指在经济活动中，某些部门、产业或区域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不断下滑的过程，随着其在经济活动中作用的下降，和其他经济组织之间的联系也不断削弱，其在经济组织中的相对位置就从中心逐步被挤到外国。边缘化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交通方式的变化、产业生命周期的演变、技术进步和资源的枯竭等，使得原有的经济优势丧失，且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建立，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出现边缘化问题。我国古代“四大名镇”地位的变化，就是典型的边缘化过程。

在新世纪优秀人才基金资助下，我们以劳动力流动为切入点，对全球化条件下的地区发展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

我们以地区制造业产值占全国制造业产值的份额及其动态变化，揭示了沿海地区对内陆地区的产业替代和就业替代趋势。比较1994年和2000年我国制造业的地区分布变动状况，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制造业产值已经占了全国制造业总产值的60%以上，并且这一比重一直呈上升趋势。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部地区、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制造业产值占全国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持续降低，而中部地区这一比重的下降幅度又高于其他两个地区。另外，从1994—2000年间制造业的总增长率来看，中部地区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甚至落后于东北和西部地区。在省级区域层次上，总增长率最低的三个省，江西、安徽、湖南都位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的另外三个省，湖北、山西、河南的增长率仅位于全国的中流水平。总增长率最高的省份除了西藏（该省制造业发展起步低，产值的基数小，所以增长率居全国之首）属于西部地区，其他几乎涵盖了所有的东部省区，依次是广东、天津、北京、上海、海南、吉林、福建、浙江、河北、山东。制造业向东部沿海地区集中的趋势非常明显，其他区域的

制造业地位均有所下降,但是中部地区的制造业萎缩尤其明显。

从发展的内在动力上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空间的重构与全球化的不断加深有着密切的关系。对外开放使得我国劳动力密集的比较优势得到充分凸显,大量外商直接投资涌入我国,通过共同收获人口红利,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和相关区域都得到迅速的发展。早期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面向国际市场,沿海地区的区位优势显现,早期的外商直接投资因此高度集中于沿海地区,这些地区也就成为收获人口红利的主要区域。归纳起来,沿海地区是我国工业基础较好的地区,过去长期向中西部地区进行着产业扩散与转移。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些地区显然进入了一个新的工业化时期,进行着反梯度的要素集聚过程,形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新型模式,并因此成为产业高度集中和就业岗位丰富的区域。应该明确的是,两个方面的因素影响地区间就业量关系。一个因素是,各地就业结构的变化导致就业增量在地区间的不均衡分配;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地区间就业存量替代关系导致地区间就业存量的此消彼长。前一个因素已经被普遍认识到,而对第二个因素的认识尚有待深化。

我们的一个基本主张是,沿海地区再工业化的过程与中部地区的就业紧缩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因果关系。从结构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中部地区就业紧缩的主要部门来自于制造业的下降。正因为制造业就业的下降,导致中部传统工业城市出现了比较突出的下岗问题。也就是说,沿海地区的再工业化,在存量方面替代了中部地区的就业。而沿海地区的“再工业化”趋势,既是沿海地区自身工业化进程的需要,又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际分工变化的结果。在这种开放型的国际分工中,原先占有区位优势的中部地区开始被边缘化,导致就业被替代,人口净迁出。产业集中度和就业岗位在地区间的变化,导致了我国地区间经济差距的持续扩大。

按照这样的逻辑,我们得出以下基本结论:开放条件下,全球化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国的经济空间格局,并将继续发挥影响。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推动了以劳动力密集型为主的非农产业的迅速发展和劳动就业比重的提高。从外商投资的产业分布看,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其次是第三产业,第一产业所占的比例极低。1979—2000年FDI合计值三大产业分布比依此为1.83%、63.25%和34.92%,非农产业合计占比高达98.17%。FDI的这种区域分布不均衡与其产业分布的不均衡交织在一起,使得我国传统的地区分工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新的全球分工体系中,沿海地区以劳动

密集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制造业得到显著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形成对中部地区相应制造业的替代，这是分析我国地区发展格局变化的宏观背景。

中部地区的边缘化是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经济全球化因素导致我国区域间的传统分工发生变化而出现的新现象。中部地区在这一边缘化的过程，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经决定，但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后，中部地区边缘化的问题表现得尤其明显。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在全球化的生产分工体系中被日益边缘化，沿海等优势区位地区对内地实现了产业替代和就业替代。以出口导向和政府投资为主要动力的增长模式，则进一步制约了中部地区的发展空间。中部地区边缘化不全是、甚至主要不是政策和主观造成，而是全球化经济规律使然。

但是，全球化下的区域边缘化理论并不意味着边缘化地区的宿命结局。创新能力也是决定区域经济增长能力的重要因素。从地区经济发展的模式上看，几乎所有国家的经济空间格局都表现为不平衡的模式，但这种不平衡性是在不断变化的。传统的梯度增长模式将增长从中心传导到外围，于是新的不平衡性取代了原有的不平衡格局，维持着传统的空间秩序，而创新则为后进地区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可能。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及交通运输的便利，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大大加快。在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信息化和市场化程度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区域增长的初始条件、区域经济的活动主体、区域生产的组织形式、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给后进地区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新的条件。

中部地区的发展最终还是要靠经济规律，但宏观经济政策对区域发展的调整、特别是对全球化的区域负效应的矫正，变得越来越突出。我国经济增长动力向内需的转移，无疑为具有国内市场区位优势的中部地区提供了重要机遇。中部地区可以借助国内市场的发育，发挥其在面向国内市场上的优势，承接沿海地区产业的转移，实现传统的梯度式增长。更加重要的是，中部地区还应该借助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机遇，通过产业创新，拓展国际市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中部地区根据国内外宏观经济背景，选准自己的定位，充分发挥自身的综合优势，特别要注意通过人力资本的培育，提高稳定增长水平和学习能力，增强区域的创新能力，并逐步获得经济增长趋同甚至赶超的能力，扩展生产可能性边界，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可能。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从全球化的角度审视劳动力流动与地区发展，从经济理论和区域经济发展一般规律中寻求答案，从宏观

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政策走向中寻找中部地区的定位，从现实的需要和可能出发提出对策。本书是集体合作的成果，杨云彦执笔前言、第一、四、七章，朱金生执笔第二章，魏博通执笔第三章，敖荣军执笔第五、六章。

本书部分内容引用了作者先前与张中华教授、徐映梅教授、陈浩教授等合作研究的成果，特向他们表示感谢。

著 者

2008 年 6 月

目 录

Contents

第 1 章 开放条件下的地区发展	(1)
1.1 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	(1)
1.2 地区发展的空间过程	(7)
1.2.1 经济发展梯度	(7)
1.2.2 区域差距的分异与趋同	(10)
1.2.3 区域经济的扩散与梯度转移	(11)
1.2.4 增长极与累积效应	(11)
1.2.5 中心与外围	(13)
1.2.6 生产周期与世界系统	(14)
1.3 全球化与区域经济发展	(18)
1.3.1 经济全球化的内涵	(18)
1.3.2 经济全球化的趋势	(19)
1.3.3 经济全球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21)
1.4 我国经济空间重构的背景与分析框架	(28)
1.4.1 我国地区发展历程	(28)
1.4.2 人口红利与发展窗口	(33)
1.4.3 劳动力流动、城市化与经济空间重构	(40)
第 2 章 全球化进程与我国 FDI 的空间格局	(43)
2.1 我国区域投资格局的演变	(44)
2.2 FDI 的空间分布	(46)
2.2.1 FDI 的内涵界定	(47)
2.2.2 FDI 的区域分布	(47)
2.2.3 FDI 空间分布差异的度量方法	(51)
2.2.4 我国 FDI 空间分布差异度量	(54)
2.2.5 FDI 的区际差异因素分解	(56)
2.3 FDI 的产业分布	(59)

2.4	FDI的空间产业分布	(63)
2.4.1	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行业分布情况	(64)
2.4.2	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行业分布情况	(65)
2.4.3	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行业分布情况	(67)
第3章	全球化背景下的区际产业转移与产业替代	(70)
3.1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产业转移	(72)
3.1.1	文献回顾	(72)
3.1.2	产业转移过程的分解——兼论中国的区际产业转移	(82)
3.2	中国制造业空间分布的变迁	(87)
3.2.1	衡量制造业空间分布的尺度与方法	(87)
3.2.2	中国制造业空间分布变动的基本状况	(91)
3.2.3	沿海对内地产业替代假说的检验	(99)
3.3	经济全球化与沿海对内地的产业替代	(112)
3.3.1	区域政策与我国制造业空间分布的变化	(113)
3.3.2	地理区位与我国制造业空间分布的变化	(118)
3.3.3	市场化与我国制造业的空间分布变动	(126)
3.3.4	经济全球化与我国制造业的空间分布变动	(132)
第4章	全球化背景下的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	(137)
4.1	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	(137)
4.1.1	引力及其模型	(140)
4.1.2	成本—收益分析	(140)
4.1.3	二元结构模型	(141)
4.1.4	迁移效应	(142)
4.1.5	人口迁移规模测算与强度分析	(143)
4.2	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与选择性	(152)
4.2.1	我国人口迁移的转变	(153)
4.2.2	迁移选择性	(157)
4.3	城乡劳动力市场发育与人口迁移	(159)
4.3.1	外来劳动力成为产业工人主体	(162)
4.3.2	劳动力市场分割依然明显	(165)

4.3.3 城市内部迁移与城乡人口互动过程	(166)
4.4 劳动力外流与农村发展	(178)
4.4.1 流出地的积极作用	(179)
4.4.2 劳动力外流的不利影响	(182)
第5章 劳动力流动与人力资本集聚	(185)
5.1 中国省际劳动力流动的选择性分析	(186)
5.1.1 劳动力流动的选择性及其人力资本再分配效应	(186)
5.1.2 中国省际劳动力流动的技能选择性	(187)
5.2 技能互补性与劳动力区际流动	(192)
5.2.1 技能互补性假说	(192)
5.2.2 技能互补性与劳动力区际流动的理论分析	(193)
5.2.3 技能互补性与劳动力区际流动的实证分析	(195)
5.3 劳动力区际流动与人力资本地区集中的实证分析	(201)
5.3.1 模型与变量	(201)
5.3.2 结果与分析	(203)
第6章 全球化的收入分配效应与地区差距	(206)
6.1 经济全球化的收入分配效应	(206)
6.1.1 全球化对发达国家收入分配的影响	(207)
6.1.2 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的影响	(209)
6.1.3 全球化收入分配效应的地区差异	(210)
6.2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地区差距分析	(211)
6.2.1 中国地区差距的统计描述	(212)
6.2.2 中国地区差距的地区分解	(215)
6.2.3 中国省际经济差距的产业分解	(217)
6.3 要素集聚与地区差距	(223)
6.3.1 理论阐释	(223)
6.3.2 实证分析	(226)
6.4 经济全球化与要素集聚	(232)
6.4.1 技能偏向型技术变化及其国际扩散	(233)
6.4.2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集中地区的技能偏向型技术变化——	

一个推断	(239)
6.4.3 外商直接投资地区集中与技能劳动力迁入的相互强化 关系的理论分析	(243)
6.4.4 外商直接投资地区集中与技能劳动力迁入的相互强化 关系的实证分析	(245)
第7章 全球化与地区经济空间重构	(250)
7.1 全球化与中部地区的边缘化	(250)
7.1.1 地区就业增长与结构变化	(251)
7.1.2 中部地区的就业紧缩与沿海地区的“再工业化”	(253)
7.1.3 产业替代与就业转移：一个分析框架	(254)
7.2 经济增长方式变化与地区发展拐点	(256)
7.3 全球化、信息化与城市群	(259)
参考文献	(264)

第1章 开放条件下的地区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外部注入资金的倾斜、内部投资主体的日益多元化,以及劳动力跨地区的空前大流动导致要素投入的倾斜,各地经济发展出现了较明显的不平衡,使得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形成的东西部经济关系发生了较大变化,这些问题已经引起决策部门和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尽管经济活动的空间形式丰富多彩,但其内在规律性却有着很多之处,德国学者勒施早在1939年就对“空间有秩序的社会”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从地区经济发展的模式和空间关系上看,几乎所有国家的经济空间格局都表现为不平衡的模式,但这种不平衡性是在不断变化的。传统的梯度增长模式将增长从中心传导到外围,于是新的不平衡性取代了原有的不平衡格局,维持着传统的空间秩序,而创新则是不断打破传统空间秩序的重要力量,为后进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可能。

1.1 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

区域经济增长,简单来讲,是指一个地区社会财富即社会总产品量的增加。它一般是用实际的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来表示。所谓“实际”是指扣除了物价变动因素。GNP或GDP的变动只是反映一个地区产品量的真实变动,用实际的GNP或GDP除以地区总人口,便得到人均GNP或人均GDP。它作为反映一个地区居民收入水平的综合指标,常常被用来评价和比较经济绩效。广义的经济增长概念所包含的范围要比这大得多,内容也更加完全。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给经济增长下

了一个经典式的定义，称之为现代经济增长。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它的居民提供种类日益增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之相应的调整的基础之上的。”^①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广义的区域经济增长定义不仅应包括经济数量的增加，而且应包括产品结构的相应变化；不仅应包括经济方面，而且应包括非经济方面，如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改变等。

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因素错综复杂，一般可分为内部增长因素和外部增长因素两大部分。区域内部增长因素包括供给因素、需求因素和空间结构三个方面。供给因素就是生产要素的增加，生产效率的提高，一般包括劳动力、资本、技术三个因素。劳动力素质提高、生产管理的改善、储蓄增加和技术进步都会促进经济增长。一般可以用生产函数来表示这些因素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需求因素包括消费和投资两方面。消费与投资之和即为区域总需求。总需求的变动往往会通过乘数效应刺激经济增长。

区域空间结构对经济效率具有制约作用。充分利用集聚经济、区位优势，建立合理的经济结构，可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空间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可归结为资源空间配置的改善，是宏观管理改善的组成部分。

影响区域增长的外部因素包括区际生产要素流动和区际贸易。前者包括劳动力迁移、资本流动、技术知识扩散等。影响劳动力迁移的非经济因素（如区位偏好、地理、气候等）与经济因素同等重要，但由于非经济因素难以把握，一般就只考虑经济因素。一个高收入的区域将吸引劳动力迁入。资本则都由低资本收益率区域流向高收益率区域。从理论上讲，区域间资本收益率将趋于均等，但由于风险不等、信息不完全等不确定因素和资本的空间集聚效益的存在，区间资本收益率无法达到均等。此外，资本存量及其不可分割性也会阻碍资本的流动。技术知识则从高度发达地区扩散到其他区域，教育和通讯的改善将有助于技术知识的传播。

影响区际贸易的因素包括区间需求和区间贸易障碍。外部对区域需求增加，区域输出就增加，将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区间贸易障碍可用区间距离、区间运输成本表示。贸易障碍减少，可降低贸易成本，促进区际贸易发展。

^① 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发现与思考”，选自郭熙保：《发展经济学经典论著选》，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页。

资本的区际流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投资被认为是经济中“发号施令”的因素。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假定单位产品的工资成本和运输成本是既定的,利润是可以预期的,那么作为新工业区形成的首要前提将是资本的来源,即新工业区能否吸引到足够的外来资本,或者它本身能否积累起足够的资本。假定不考虑外来资本的流入,那么,这一地区的资本供给只可能取决于本地区的储蓄能力和居民的储蓄意愿。储蓄能力直接与一区的国民收入水平有关,较高的国民收入水平才有较高的储蓄率,才能提供较多的资本供给。居民储蓄意愿还涉及不同地区的制度与文化因素,例如对消费和储蓄的态度、消费和储蓄的习惯等。

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不仅要有资本供给,而且还要有对资本的需求。从地区对资本的需求的角度来分析,假定新建立企业以本地区为主要销售市场,那么对资本的需求首先取决于对投资的吸引力,而对投资的吸引力又以本地区居民购买力的大小为转移。当地国民收入水平越高,居民购买力越大,利润越有保证,则越能吸引投资,从而对资本的需求也越大。此外,对资本需求的大小也与本地区的生产技术类型有关。这里所说的生产技术类型,系指该地区的产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或是技术密集型产业。综合资本的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来看,如果一个地区对资本的需求大于资本的供给,就需从其他地区引入资本;相反,如果一个地区对资本的需求小于资本的供给,则会导致资本转移到外地。

关于劳动力的流动,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个体的迁移决策是基于成本—收益原则谋求预期收入的最大化的行为。预期收入由就业概率乘以任意经济部门的平均收入来得到。迁出地和迁入地之间预期的收入差,减去移动成本,得到移动的预期净收入,如果其为正数,则将刺激迁移。按照新古典理论,劳动力由低工资国家向高收入国家流动,而资本(包括人力资本)以相反方向流动。其结果,迁移可以缓解流入地工资的上升压力,以及流出地工资的下降压力,直至达到均衡。在均衡点上,地区间工资差正好等于迁移成本(包括心理成本),净迁移为零。

成本—效益理论常被用来解释迁移的选择性。人口迁移的选择性是指具有某些特征的人群比一般人更容易迁移的现象,如青年人在迁移中占主导地位的现象。依照成本—效益理论,年轻人、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人更容易迁移,其原因在于他们迁移所获得的收入更高,而迁移成本包括机会成本较

低，在克服迁移障碍方面有更大的优势等。

劳动力市场分层理论（Segmented Labor Market Theory）则将迁出视为需求驱动的，嵌入先进工业社会的经济结构之中。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导致劳动力市场分层，产生了一个主导部门，其收入和工作条件优越；另外还有一个二级部门，其工作不稳定、收入低下、福利有限、工作条件恶劣。由于二级部门对经验、技能、教育的回报率低下，发达社会的劳动力不愿从事这一部门的工作，导致劳动力的短缺。其结果，雇主只有雇佣外来移民填充这一被本地劳动力排斥的行业。

资本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资本的区际流动既是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变化的结果，又是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变化的重要决定因素。资本是劳动者从事生产活动的必要条件，同时又是技术的载体，劳动力和技术的区际流动通常要以资本的区际流动为条件，而资本的区际流动必然会促进劳动力和技术的区际流动。

一定数量的资本，客观上要求与相应数量的劳动力相结合。一个地区如果没有充分的作为劳动资料的资本，劳动力就会相对过剩，由此就要求将劳动力转移到区外，或者从区外吸收资本；相反，如果一个地区现有的作为生产资料的资本超过现有的劳动者所能支配的程度，机器设备等就要闲置，因此需要向区外转移资本，或者吸收区外的劳动力。从质量上看，一定种类和性能的机器设备，要求具有相应的技术水平和劳动熟练程度的劳动者去掌握和运用。如果说在科学技术水平很低、基本上是靠使用手工工具进行生产的条件下，对劳动者的数量要求是主要的，那么，在科学技术迅速进步、机器装备不断更新、生产机械化和自动化程度显著提高的条件下，对劳动者的质量要求便日益成为主要的了。如果劳动者的质量不能与现代化的生产工具相适应，那就会带来一些不良后果：现有的先进设备因缺乏懂技术、会操纵的工人而不能运转；或勉强运转而不能充分发挥设备效能，甚至造成事故；并且还会出现部分劳动者因不能适应现有设备技术要求而过剩的现象。由此则会产生结构性的劳动力及资本区域流动，诸如技术素质较高或熟练程度较高的劳动者流向资本技术水平高的地区，或者向技术水平较高的劳动者集中的地区转移资本。

资本和劳动力在区际流动上的相互适应，在不同的体制下，其运行机制是不同的。根据 Sjaastad 的研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劳动者面临几种可供选择的迁移地点时，通常是选择预期净收益最大的一处。具体地说，迁移

者的考虑分为两个层次：首先，他们希望迁移后能使预期净收益大于零；其次，在几个预期净收益大于零的地点中，选择预期净收益为最大值的一处。这样，迁入区与迁出区的预期收益的比较和迁移成本便成为决定迁移的重要因素了。资本相对充裕的地区，劳动力供不应求，工资收益趋于提高，劳动者的预期收益是较大的；相反，资本相对匮乏的地区，劳动力供过于求，工资收益趋于下降，劳动者的预期收益随之减少。前者产生一种“拉力”，后者产生一种“推力”，这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造成了劳动力的实际迁移。

与劳动力的区际流动相同，在资本所有者面临几种可供选择的投资地点时，通常也是选预期净收益最大的地点。一个地区劳动力供给充裕，劳动力价格较低，或者劳动生产率较高，单位产品的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就可能吸引资本流入；相反，劳动力供给不足，劳动力价格高，或者劳动生产率低，单位产品的劳动力成本较高，则有可能导致资本的流出。

劳动力不仅是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作为生产者的劳动力，其数量和质量要与资本的数量及质量相互适应；作为消费者的劳动力，其流动与资本的区域流动也是相互影响的。劳动力作为消费者，其生存、发展和享受必须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消费资料及基础设施的供给等，一个地区劳动力人数的增加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会扩大对投资的需要；一个地区资本的增加，消费资料供给的丰富和基础设施的完善，又将增加对劳动人口的吸引力。

以上是就劳动力流动与资本流动的一般关系而论的。实际上，由于劳动力的流动还受许多预期收入以外因素的影响，资本的流动也受许多预期收益以外因素的影响。因此，现实中劳动力区域流动与资本区域流动的相互影响，远比我们上面所说的复杂。

就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比较而言，劳动者的技术水平越高，对于工作地区的收入以外的要求也会越高，包括工作地区的社交生活、科学与文化生活、家庭生活的便利程度、子女受教育的环境等等，这些要求并不一定用货币工资率的高低来反映。因此，对技术熟练劳动力来说，即使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工资相对水平较高，那里也较少吸引力；相反，经济发达地区的工资相对水平虽然较低，但仍然有较大的吸引力。这样，越是需要技术熟练劳动力的投资项目，就越有可能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非熟练劳动力的供给状况和工资相对水平的高低，对这类资本的流向所起的作用不大；相反，主要依靠大量非技术熟练劳动力的投资项目，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将可能优先考虑劳动力供给状况和工资相对水平高低这一因素。